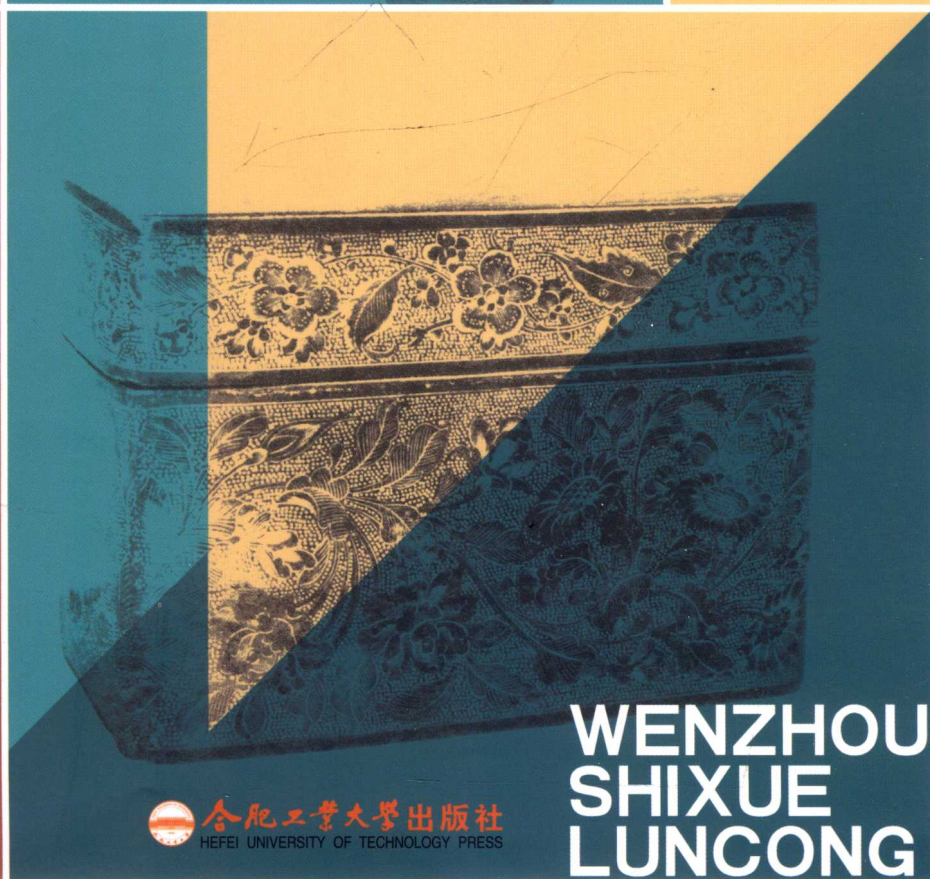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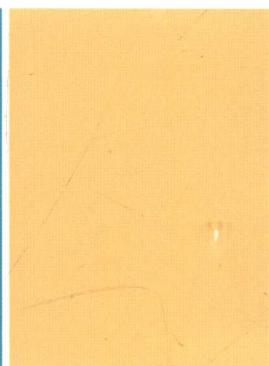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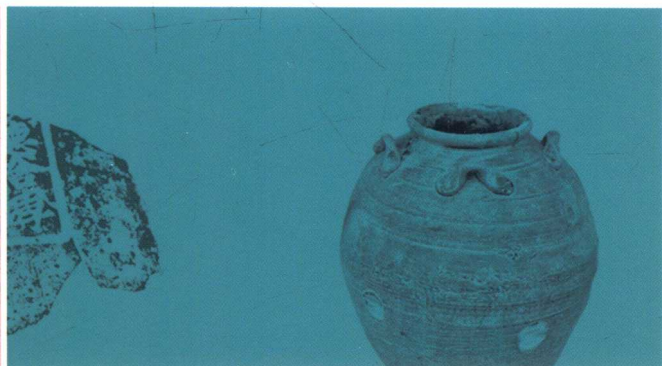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温州市历史学会/主办

温州史学论丛

(第四辑)

徐华炳 陈 勇/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WENZHOU
SHIXUE
LUNCONG

温州史学论丛

(第四辑)

徐华炳 陈 勇 主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史学论丛·第四辑/徐华炳,陈勇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7-5650-2055-1

I. ①温…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温州市—地方史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367号

温州史学论丛(第四辑)

徐华炳 陈 勇 主编

责任编辑	章 建
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30009)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22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650-2055-1
定 价	50.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言

《温州史学论丛》至此已经出版到第四辑了。前三辑虽是以学生习作为主，但每一辑特色都很明显，都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本辑共收入 34 篇文章，涉及温州地方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其中温州地方史的 10 篇论文，不再像以前那样仅局限于温州区域，而是将研究空间扩展到浙江全省乃至省外。如有以浙西的衢州为考察范围的《孔氏南宗在衢州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和《衢州车塘村吴氏宗祠研究》，还有涉及安徽、湖南的《浅析“千载诗人地”诗文厚重的原因及价值》和《陶澍与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形成》。从研究内容来看，不仅有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常规性选题，而且涉及社会史、宗教史等领域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如《唐代的尊老养老制度研究》《北宋温州道士林灵素述评》和《试论陶弘景对道教神仙体系构建的影响》。此外，本辑首次出现书评性文章，如《简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和《〈寂静的春天〉争论的历史学解读》等。

编辑、出版《温州史学论丛》最初是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与温州市历史学会共同发起的，旨在为研究、关心和爱好温州地方史的专家、学者、社会人士提供学习与交流的平台，研讨温州的人、事、物，推进温州史学研究的繁荣与进步；同时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发表论文的阵地，为专业师生提供切磋学术的契机。按照初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历史专业教师和温州市历史学会的会员理当是论丛的核心作者。但至今出版的四辑中，老师或会员单独撰写的文章不到 10 篇，师生合作的文章也甚少，大量文章出自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的中国史研究生和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生之手。这样组稿，的确有我们老师的良苦用心，希望给

这些学生一个练笔的机会和发表文章的通畅渠道。但学生学术水平的参差不齐，使得稿源总体质量不高，文章内容的“学院派”气息过重，论丛的学术档次也难以提升。不仅如此，写作群体以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学生为主，势必在客观上“排除”了温州地方文史爱好者，从而使论丛的社会影响力不广，社会认可度亦不强。

囿于己见，以上现象或许限制了《温州史学论丛》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建议做三点尝试性改革：第一，公开向温州社会征稿，积极邀请社会上的文史爱好者赐稿；第二，要继续鼓励在校学生踊跃投稿，并对其稿件进行认真筛选；第三，坚持“温州史学”的宗旨，既包括写作群要以温籍学者和在温工作的学者为主，更要在选题上紧扣“温州史学”主题，从而办成一本非“大路货”的、具有鲜明温州地域特色的史学论丛。由此，以期更好地服务地方，弘扬温州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温州大学中国史硕士点学位负责人

王兴文

目 录

(温州) 地方史篇

- 试论《永嘉郡记》的价值 尹天翔 (003)
- 北宋温州道士林灵素述评 郑 重 (014)
- 温州移民文化对瓯地的影响
- 以温州方言、地名、宗教为例 沈棋栋 (022)
- 清末新政时期地方士绅的权力空间：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 田惠萍 (038)
- 民国时期温州钱庄的制度及其弊端 潘立川 (050)
- 瑞安民间艺术的渊源与发展现状探究
- 以瑞安鼓词、越剧、高腔等为例 马 喆 (060)
- 孔氏南宗在衢州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周烨芸 (085)
- 衢州车塘村吴氏宗祠研究 吴彩梅 (098)
- 浅析“千载诗人地”诗文厚重的原因及价值 申业磊 (109)
- 陶澍与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形成 郑 雪 (121)

中国古代史篇

- “诗史互证”与《麟之趾》本义探究 刘凯奇 (135)
- 浅议西汉前期同姓王问题 郑 鹏 (145)
- 试论陶弘景对道教神仙体系构建的影响 张振楠 (152)
- 论刘知几的直书思想 叶欣欣 (165)
- 唐代的尊老养老制度研究 张水晶 (175)

论唐朝马政的发展及繁盛原因	苏 颂 (184)
从卫所变迁论明代浙江海防特点及得失 ——以台州桃渚所为例	罗 丹 (197)
刘基诗友关系考	尚明龙 陈 清 和兴旺 (209)

中国近现代史篇

理解之同情：从另一方面评价近代不平等条约 ——以《中法新约》为例	刘金君 (233)
清末民初妇女社会地位变迁	陈美华 (241)
19 世纪中后期来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徐晓燕 (249)
简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方晓青 (262)
浅谈北洋政府的修约运动	孙晓芳 (270)
《申报》对五四运动的舆论导向	王敏君 (280)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与复出述论	张 茜 (291)
论郁达夫文学作品中的历史观	邵 群 (304)

世界历史篇

13 世纪的商业革命及其影响	金 晨 (319)
自然环境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与影响 ——以 1812 年法俄战争为例	任娇娇 (332)
赞赏与崇尚：切·格瓦拉与中国情结	潘 达 (340)
论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	吴佳佳 (351)
浅议民主社会主义	冯 超 (363)
《寂静的春天》争论的历史学解读	陈政伊 郑春生 (376)
留美学人齐思和与世界史研究	洪楚瑶 (391)
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复习专题整合中的运用 ——以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为例	周芳娟 (403)

〔温州〕地方史篇



试论《永嘉郡记》的价值

尹天翔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重视历史典籍的国度。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史籍汗牛充栋，在多种类型的历史典籍文献中，或多或少包含着各地的情况介绍，而对于地方情况最为详细的介绍，则非地方志莫属。地方志可以称为方志，也可称为志乘。“志就是记，即为记录、记载的含义”^①。因此，地方志主要是对一个地方情况的记录，记载着各个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地理环境、物产资源、人文风貌。从秦汉以后到唐宋，地方志书的体例逐步地完备起来。在东汉以后，地方志文献著作逐渐增多，到了晋、南朝时期则是地方志编撰的高峰时期，产生了众多的地方志。其中，《永嘉郡记》即为该时期的一本著名地方志著作，在浙江地方志的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该书在宋以后亡佚，但后人从各种历史典籍之中将与其相关的条目一一辑录出来，从而为研究晋宋时期的温州地区历史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证据。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前人的佚文辑本中分析其所蕴含的价值，以及对于温州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永嘉郡记》的产生

郑缉之的《永嘉郡记》在其他典籍中引用时，或题作《永嘉记》或《永嘉地记》。《永嘉郡记》在隋唐的历史典籍中都没有被记载，但是“自梁刘孝标

^① 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03。

《世说注》以下，诸书多见征引，而《御览》历录尤夥；或省文称《永嘉记》”^①，由此可认为《永嘉记》是《永嘉郡记》的省略称呼。而在东晋南朝时，地记的著述非常丰富，后人在摘抄时根据本书的体裁对其书名作了变动，因此也有可能被写作《永嘉地记》。综合上述，《永嘉郡记》《永嘉记》以及《永嘉地记》其实是一本书，不同书名的出现或许在于征引摘抄时所出现的缺漏，或者是由于改动的问题。

刘纬毅在《汉唐方志辑佚》中认为，郑缉之的著作为《永嘉郡记》，另有《永嘉记》一书为谢灵运所作。其依据为《太平寰宇记》中所征引的两个条目归于谢灵运名下，即“卷一〇一·浦城县”引谢灵运《永嘉记》“（浦城县）有二浦。一曰柘浦水”，以及“卷九九·丽水县”引谢灵运《永嘉记》“（缙云山）凡此诸山多龙须草，以为攀龙而坠化为此草”^②，并且在简要介绍谢灵运生平时提到。但在《宋书》的“谢灵运传”中并没有著录此书。清代孙诒让则认为，《太平寰宇记》所引的《永嘉郡记》柘浦水条目应该是郑缉之所写，不然则可能为乐史误题谢灵运的名字，因此孙诒让对于谢灵运撰有《永嘉记》一书持保留态度。洪焕椿在《浙江地方志考录》中的温州府属下第一篇《永嘉记》也征引孙诒让的观点，认为“《永嘉记》疑即郑缉之《永嘉郡记》”^③。而鲍远航持有不同观点，提出《太平寰宇记》所征引这两条有可能出自谢灵运的《游名山记》。他认为“由于谢灵运在永嘉作有《名山记》即《游名山志》，乐史引录则曰：谢灵运永嘉《记》，而非谢灵运《永嘉记》”^④。由此提出《太平寰宇记》中所征引的《永嘉记》条目归于谢灵运而非《永嘉记》是谢灵运的著作，这或许是因为古时的图书没有标点，因而后人在断句时基于解读不同而产生了歧义。同时，对比孙诒让《永嘉郡记》辑本中其他记载山的条目内容的写法，可以看出郑缉之的记载方式相当简练，在编纂时几乎没有用过比喻、排比的写法，因此从文章风格来看，鲍远航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综合上述各家观点，《永嘉郡记》和《永嘉记》当为同一本书，作者即为南朝宋的郑缉之。

①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校集本。瑞安：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7。

② 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2。

③ 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234，235。

④ 鲍远航。永嘉记作者与亡佚时代考。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9）：35-37。

郑缉之在史籍上无传，有关其生平背景资料也甚少。孙诒让在《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中论道：“郑君述造颇多，而名德弗曜，《沈书》《李史》，姓字盖阙。”由此可知郑缉之生平事迹在历史上鲜有记载，在沈约的《宋书》以及李延寿的《南史》中均无其相关记载，可见其名声不甚响亮。但在《隋书·经籍志》卷三三中出现了一条有关郑缉之的记载：“《孝子传》十卷，宋员外郎郑缉之撰。”^①郑缉之编撰的地方志著作除《永嘉郡记》外，“另有《东阳记》一书”^②。而根据孙诒让《校集郑缉之〈永嘉郡记〉》一书中“官秩所至，略可考见”的说法，郑缉之的官职应为宋员外郎。鲍远航考证认为，“员外郎”为编制之外的官职，而非编制之内的官职，因此郑缉之的官职或许并非职事官。同时，郑缉之可能只是在“永嘉、东阳二郡担任过官职”^③，因而对于这两郡的地理物产以及民情风俗了若指掌，故而才会将这些实际情况形成文字并著作成书。

二、《永嘉郡记》的亡佚时代以及辑本

《永嘉郡记》一书，正史并未著录，但在相关典籍、类书中都有被征引条目。如在其成书后不久，就被南朝梁刘峻注释《世说新语》、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南朝宋刘敬叔《异苑》等所引用^④。可见在南北朝时期，《永嘉郡记》就有一定的影响，引起过当时文人的关注并且对其内容予以肯定。尔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段成式《酉阳杂俎》、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以及宋李昉《太平御览》和乐史《太平寰宇记》等重要典籍、类书也多有引用。由此可知，《永嘉郡记》是唐宋时期编纂类书过程中的一本重要的地方志文献来源。而在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五三和《温州经籍志》中，《永嘉郡记》均被著录，是目前可考的最早著录此书的历史典籍。

《永嘉郡记》原书已经在宋代以后亡佚。其佚文辑本有清代陶珪重编的宛委山堂本《说郛》，但是孙诒让认为“其所辑寥寥数条，既不赅备，又不注出处，

① 长孙无忌等撰. 隋书·经籍志. 北京：中华书局，1985：51.

② 周立人. 孙诒让与郑缉之永嘉郡记. 温州晚报，2012-11-10：10.

③ 鲍远航. 南朝郑缉之永嘉记考述.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3）：82-86.

④ 徐顺平. 徐顺平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646-648.

伪夺甚多。今亦不复备校”，故孙诒让重新辑录有五十余条。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也辑录佚文四十多条。比较上述辑本，孙诒让的辑本最详。经其考证诸书，认为所引《永嘉郡记》，书名颇多省易，有称作《永嘉记》者，有称作《永嘉志》者，其实是一本书，而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温州府志》则将其名称作为《永嘉郡志》，孙诒让考证认为“诸书所引悉无此称，不知何所据”，或与当时习惯的书名方式有关。因此，经其校集考证而成的《〈永嘉郡记〉校集本》所含佚文五十一条，是至今最为完备的一个辑本。

三、《永嘉郡记》的价值

郑缉之的《永嘉郡记》虽然在宋代以后亡佚，现已无法知晓全书的本来面貌，只能从各类史籍中的征引来看到部分内容，但仍可从现在辑录的条目中发现其诸多方面的价值。

（一）《永嘉郡记》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修史书的风气盛行，并且史家大多是门阀士族。由于门阀士族与寒门庶族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士族之间的门第观念又根深蒂固，因此高门士族往往希望通过编纂史学族谱来限制庶族地主，以保持士族地主的优势地位，同时在士族地主之间亦可以再排位分高低，正是基于此，众多士族会将目光投至于地方志书的编纂。这些门阀士族生长于各自的郡县之中，熟悉本地的山川河流、地理形势、风土人情，编纂时得心应手，风格也各不相同。因此，六朝时期的浙江方志也就形式多样、品种丰富。而按照内容划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人物传记，第二种为记载各郡的地方志，第三种为记载山林名胜的专门志。”^①至东晋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之间特别是浙江地区土著门阀与南渡而来的北方门阀士族之间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使得私修史书中间地方志的比例开始增多，并成为主要形式。当然，各地方志的内容因地区、开发程度和撰写者的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即便同时期的地方志也各具特色，如孔灵符的

^① 王志邦，黄佩芳．六朝浙江方志概论．丽水师专学报，1986（3）：13-17.

《会稽记》记载山、亭、人物等，以记山川为主；山谦之的《吴兴记》记载山川、沿革、祠庙、人物等，多涉及历史沿革方面的载录；刘道真的《钱塘记》则记载山川、泉水湖泊、传说等。而现存的郑缉之的《永嘉郡记》佚文则是以记载风土物产为主要特点，其中记载山的条目为十条，记载水的条目为十条，记载物产有二十二条，记载与人物相关的条目大约四条，记载乡亭的三条，专门记载传闻的一条，在某些条目中也含有部分传闻。

(二)《永嘉郡记》的地理价值

《永嘉郡记》记述了东晋永嘉建郡百年间的地域、山水、物产、人物、异闻等方面的一些情况。根据书中记述的有关内容来看，当时永嘉郡的地域范围包括永宁县（今为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永嘉县）、乐成县（今为乐清市、台州市玉环县）、安固县（今为瑞安市、文成县、泰顺县北一部分）、横阳县（今为平阳县、苍南县、泰顺县南部）、松阳县（今为丽水市城区、青田县、松阳县、庆元县、云和县、景宁县以及缙云县、龙泉县的一半），除此之外，还包括今福建省北部福鼎、柘荣等县。可见，相对于今日的温州而言，当时永嘉郡的地域要辽阔得多，其范围横跨闽浙两省。由于从东晋时期到南朝宋，永嘉郡的地域范围基本未变，郑缉之在编纂中所涉及的地域范围肯定超出如今的温州地区，所以从地域范围来说，它具有很大的历史地理考证价值。如书中记载怀化县有蒋公湖，其位居遂昌县东二十里，而遂昌当时属东阳。虽有人怀疑此内容是在传抄过程中，将本属于东阳的遂昌县错误地转移到永嘉郡，但徐坚在《初学记》中也说“永嘉有蒋公湖”，可见当时的永嘉郡界范围涉及遂昌地界，故上述内容当为《永嘉郡记》原文记载而非后人传抄错误。亦因此，通过分析《永嘉郡记》佚文，可以大致了解在东晋南朝时期永嘉郡所包括的各县范围，而且通过其中内容可辨析各个地点当时的归属等情况。

在《永嘉郡记》中，记载的山有罗浮山、泉山、帆游山、仙石、地肺山、木履山、涛山、西隗山等，从这些条目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永嘉郡的山川形势以及相关情况；在河流水源方面，它记载了瓯水、恶溪帆石、柘林水、梧桐水、桃枝水、青田溪鱼仓、城门山溪布、蒋公湖、恶道溪右军墨迹、尘屿等，内容还涉及泉水、瀑布等；在物产方面，主要包括乡亭、人物、传闻等三个方面，记载的内

容相当丰富,品种亦甚多,如甘蔗、石硯、大鲇、三京亭、孙恩城、官梨、白鹤、蛎、漆棺、王兴道、张薦、襄瓜、竹青、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恒山、黄精、细辛、八辈蚕、蜜蜂、山鬼等。

《永嘉郡记》虽然与后来温州地区的地方志相比,其内容主要局限在地理物产之间,并且描述比较简陋,但仍含有当时永嘉郡的重要信息。如孙诒让辑本中“瓯水”条目曰:“瓯水出永宁山,行三十余里,去郡城五里入江。”^①根据考证,永宁山在今永嘉县,瓯水应该是如今的楠溪江,“入江”应该是指入永宁江。而明代以来,郡县的地方志都以永宁江为瓯江,不能区分瓯江与瓯水的差别,其实永宁江的源头应该在现今的丽水,与瓯水的源头不同。

关于永嘉郡的地理文献史料非常少,宋元时期的旧时典籍已经不可得,故基本以明代以来的地方志书作为征信,而《永嘉郡记》这本地方志的产生时代却远至南朝宋。作为如此久远的历史地理史料,它目前虽然所存只是残篇断章,但其本身的存在就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地理史料价值,无疑可作为修订温州地方志的重要参考文献。

(三)《永嘉郡记》的经济价值

《永嘉郡记》所记录的物产丰富,品种众多。动物包括香螺、文蛤、溪鱼、大鲇、蛎、鲫鱼、白鹤、八辈蚕、蜜蜂等等,其中水产品种类尤多,在佚文中记载的水产品有七种。水果包括甘蔗、梨等,药材则有恒山、黄精、细辛、黄蘗、黄连等,矿产则有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硯等。

据《永嘉郡记》记载,甘蔗已在浙江沿海地区种植。中国种植甘蔗的起源可能在华南地区,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遍布江南和四川等地”^②。《太平御览》“卷九七四·甘蔗”则征引《永嘉郡记》,“乐城县三州府,江有三洲,因以为名;对岸有浦,名为菰子,出好甘蔗”^③。可见甘蔗当时在乐成县三州府对岸区域已经有种植,并且此地出产的甘蔗味道尚佳。这条记载可以说明两点:首先,该地区的土壤和气候适宜甘蔗的生长,而且出产的甘蔗是优良品种;其次,

①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校集本.瑞安: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25.

② 彭世奖.关于中国的甘蔗栽培和制糖史.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3):247-250.

③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校集本.瑞安: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33.

证明到南朝宋时期甘蔗已经传到温州地区，并且适应温州的环境。

“官梨”是《永嘉郡记》所载的当时出现在永嘉郡境内的另一种重要物产。“青田村，民家多种梨树，名曰‘官梨’”^①。其结出的果子有一围五寸，并且味道甘甜，个头大，被作为御梨进贡朝廷，所以梨树附近有专人吏司看守，使得当地人无法尝到梨的美味。这则材料在《太平御览》“卷九六九·梨”、《齐民要术》“卷四·插梨”、《初学记》“卷二八·梨”和《艺文类聚》“卷八六·梨”中都有所征引。这条记载可以说明：第一，可见当时梨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已经达到“长江流域一带”^②，且深入地区广泛，所以在青田村这个小范围之内也能够种植梨树。第二，当时青田村种植的梨品种优质，享誉范围广泛，因此才能作为御梨。第三，从青田村的梨能作为官梨可以推断，当时的中国政治中心开始南移。因为永嘉南渡之后，东晋的政治势力范围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南北朝时期，南朝的政治势力基本难以逾越至长江以北，偏安一隅。而且经过东晋的发展，到南朝宋时期，南方的政治环境相对北方来说比较稳定，因此在东晋“太宁元年（323）”^③才开始建郡的永嘉郡，因为离南朝宋的政治中心较近，所以其种植的梨才能有机会成为御梨。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此时期的永嘉郡和中央的联系相对于以前较为密切，其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不然产于此地、味道甘美的梨子既不会为中央所知，也不会出现梨子有专人看守，而当地人反而不知其味道的情況。第四，当时对于经济作物的开发仍然较为薄弱。因为青田出产的御梨主要为皇家特供，而不是普遍地流入市场成为一种商品，因此在《永嘉郡记》中梨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珍贵的贡品，而不是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

除了甘蔗和梨，襄瓜是《永嘉郡记》所记载的又一种水果。据其载，永嘉襄瓜在农历八月成熟，到十一月的时候，它的瓜肉为青色，瓜瓢为红色，味道清甜，大致上应该为一种甜瓜，而且在各种瓜中有一定的名气。按照时间和外形推断，它大约生长成熟于秋季。

从《永嘉郡记》对水果的记载内容来看，郑缉之对于水果的描述大致集中在其外形和味道方面，挑选的种类是当时他所知道的永嘉郡里最有代表性的水

①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校集本。瑞安：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37。

② 黄欢。梨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0：10-12。

③ 沈克成。温州历史年表。北京：北京电子出版物中心，2006：6-13。

果。但是他对于水果的其他方面着墨较少，考察与《永嘉郡记》同时期的其他地方志的佚文，同样发现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很少。探索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郑缉之本人对于当时市场上流通的水果关注不足，也有可能是其本人撰写风格所致，他在《东阳记》中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过多记载。当然，从这几种水果的记载中，既可以了解到当时温州地区的环境能够适合这些水果的生长，又可以了解到当时温州地区的政治地位已经有所提高，至少拉近了与政治中心的距离。

虽然对于水果生产的介绍较少，但这一时期，温州的农业生产仍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仅从《永嘉郡记》所记载的温州养蚕业的发展中就可见一斑，其中详细介绍了永嘉的“八辈蚕”^①：

欲作“爱”者，取蛭珍之卵，藏内罌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盖覆器口，安矾泉、冷水中，使冷气折其出势，得三七日，然后剖生，养之，谓为“爱珍”，亦呼“爱子”。绩成茧，出蛾生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之“爱蚕”也。藏卵时，勿令见人。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得知，在东晋南朝时期的温州地区，农民在养蚕时已经能够利用低温来人工控制蚕卵的孵化。即把蛭珍的卵放在瓦器中加上盖，让卵在低温中能够延迟 21 天才孵化，从而可以在一年内养八批蚕，并让这八批蚕分别在一年不同时期作茧，由此被称之为“八辈蚕”。不仅如此，这种通过低温制取的蚕，其所产的蚕丝数量和质量都优于传统方法生产的茧丝，“八辈蚕的养殖方法既能够解决多次养蚕的蚕种问题，同时又尽可能达到较好的蚕丝生产的目的”^②。同时，从郑缉之能够详尽地记录八辈蚕的养殖工序可以推测，当时养八辈蚕的养殖户基本都是按照此流程进行养殖的，并且这套工序是众所周知、比较成熟的一项农业技术。加上当时永嘉郡城附近有大片桑园，养蚕业也因此兴盛。所以，从《永嘉郡记》关于八辈蚕养殖过程的记载说明，在东晋南朝宋时期温州地区养蚕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可以看出当时永嘉郡的农业技术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

① 郑缉之撰；孙诒让校集。永嘉郡记校集本。瑞安：瑞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47。

② 汪子春。我国古代养蚕技术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人工低温催青制取生种。昆虫学报，1979（1）：53-59。